

復興崗學報

民 96，90 期，37-72

傳播科技發展及其在不同時期戰爭中的新聞產製

胡光夏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針對不同時期的戰爭中，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戰爭新聞產製間的相關問題加以分析。本研究依照傳播科技的發展歷程，將媒體戰爭新聞產製的時期區分為：「平面媒體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戰爭報導）、「廣播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報導）、以及視覺媒體戰爭等三個時期。不同傳播科技的出現，對於軍隊與媒體間的互動、戰爭新聞產製都帶來了新的考驗與挑戰。

本研究計分為六大單元，依序是前言、相關文獻檢視、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廣播媒體的戰爭報導、視覺影像媒體的戰爭報導與結論。

關鍵詞：新傳播科技、波斯灣戰爭、網際網路、新聞產製、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War Reporting in Different Wars

Guang-shiash Hu

Associate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By using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war reporting in different wars.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production of war reporting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war reporting of print media (prior to the World War II), radio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nd visual media.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ll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and the production of war reporting.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war reporting of print media, the war reporting of radio, the war reporting of visual media, and conclusion.

Keywords :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ersian Gulf War, Internet, News Production,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一、前言

McLuhan (1964) 在《瞭解媒體》(*Understanding Media*) 一書中，將人類歷史演進依媒體的發展，區分為口語、文字、印刷和電子傳播等四個時期。儘管 McLuhan 的一些有關傳播科技與社會關係的論述，曾被批評為是「傳播科技決定論」¹，然而對於瞭解傳播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仍有些助益。

依照 McLuhan 的說法，在前文字或是更為古老的人類社會是屬於口語傳播時期。在此一時期中，族群的所有成員以享有現時性的共同經驗為特色，而當時的社會呈現出整體性、同質性、親密性、文化穩定性、包容性、同理心、高度的整合意識與非文字的思考與經驗。McLuhan 認為，此一時期的人類社會是生活在聲音的情境中，是以聽覺感官作為主宰。

第二個時期是文字時期。此時文字的寫作開始出現，特別是希臘字母拼音出現後，人類的傳播領域開始產生劇烈的轉變，從原先的「聲音領域」轉變為「視覺領域」，從僅存在現時性、同時性的話語，變成是視覺（紙上的文字），人類社會也開始擺脫了空間領域對於傳播的侷限。此外，寫作也使個人可以脫離族群，而有助於個人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有助於帝國的建立，例如可以從事民事和軍事的統治。

第三個時期是印刷術的出現與普及。印刷術的出現加速了一些社會的變化，特別是個人主義的興起。印刷鼓勵知識的分歧化與個別專家的興起，也為政治的整合與現代國家的成立，創造了制式與集中化的情境。

對於近代人類社會產生最大影響的是第四個時期——電子傳播媒體的出現。在 1830 年代出現的電報，是人類所發明的第一個電子傳播科技。之後的電影、廣播、電視與網際網路等電子傳播媒體的相繼出現，使得人類社會得以實現 McLuhan 在 1960 代所提出的「地球村」構想。

McLuhan (1968:134) 認為，「全新感官領域的」廣播提供地球村的動力，因為廣播「激發……多面新的形態、多樣的新形象，消除了單一簡化的視覺傾向²。」電視僅是比廣播多增加影像，但對於地球村而言，其較大的差別是後來地球軌道上衛星的出現 (Gladney, 2004)。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而言，新傳播科技的不斷出現，逐漸改變了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角色。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前新聞部總裁 Lawrence Grossman 在談到

¹ 傳播科技決定論是指，強調新傳播科技的出現會帶動社會的變遷。由於將社會變遷的因素歸於傳播科技，後來被許多的傳播學者稱為傳播科技決定論。

² 單一的視覺是指印刷媒體所提供的文字視覺。

傳播媒體的發展對於閱聽眾的影響時表示：「印刷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讀者。影印機讓我們通通變成發行人。電視機讓我們通通變成觀眾。數位化網路則讓我們通通變成廣播員。」（轉引自蔡繼光等譯，2000：71）。

正如 Harold Innis、Marshall McLuhan、Elizabeth Eisenstein 等人所指出的，能近用³與控制傳播的改變，也使得說故事的方式，包括歷史本身也改變了（轉引自 Gerbner, 1992:244）。在新聞學的論述中常強調，今日的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而電視媒體所呈現的訊息特色就如同 Gerbner（1992）所形容的是一種「瞬間歷史」（instant history），也是屬於一種「影象歷史」（image history）。

對於新聞產製者而言，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也深深影響著新聞守門人對於新聞的產製。以 1830 年出現的蒸氣動力的印刷術為例，開啟了現代的大眾傳播媒體與傳播（Hoffman, 2006:177）。電報的出現與應用於戰爭新聞的採訪與傳送，使得戰爭報導的公共面貌從此產生了改變，使人類不再完全仰賴騎馬或書信等方式來傳遞新聞（胡光夏，2007）。後來的衛星傳播與 CNN 的二十四小時電視新聞等的出現，更使得新聞的產製達到了同步與立即性。

檢視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越戰前有關媒體與戰爭的相關學術研究文獻較為缺乏⁴，越戰之後，相關的學術研究才陸續出現，特別是對於 1991 年與 2003 年所發生的波斯灣戰爭，以及 2001 年「911 事件」之後的反恐戰爭。Hallin（1997:206）將以往媒體與戰爭的研究歸納為三種研究取向：媒體與民意研究⁵、戰爭媒體社會學研究⁶、戰爭文化研究⁷。Carruthers（2000:11）則將戰爭與媒體研究歸納為以下幾項：媒體在單一衝突或事件中的表現、戰地記者回憶與說明、軍事與媒體關係分析、戰時媒體應用（如宣傳戰、戰爭照片或影片）等。在這些學者的歸納中，較為忽略的研究面向是媒體在不同時期戰爭中所採用的傳播科技，以及這些傳播科技對於戰爭與戰爭新聞產製的相關議題。

由於戰爭的演進與戰爭報導都與科技的發展與採用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檢視在不同時期的戰爭中，新傳播科技的出現，對於戰爭本身與

³ 「近用」一詞是從英文 access to media 翻譯而來，原意是指接近與使用媒體，也就是從媒體扮演著公共領域角色的觀點出發，能使一般民眾都能有公平的接近與使用。

⁴ 其中較廣泛探討且有用的書是由 Philip Knightly（1975）所執筆的 *The First Casualty*，但此書並非從學術性的角度來加以探討（Hallin, 1997:207）。

⁵ 此類研究時大都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法（Social Survey Methods），瞭解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究竟是支持或者反對，此類研究大都缺少民族誌的研究（ethnographic studies）

⁶ 主要的研究包括：探討新聞記者報導戰爭新聞的例行性本質，媒體與軍隊、政府和其它成員在戰時的關係，以及戰爭報導的經濟情境等。

⁷ 在這三種取向中，此一取向較少，但已逐漸累積中。戰爭的文化研究將戰爭視為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也是一種流行文化的一部份。

戰爭新聞產製所帶來的影響。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資料來源為學術期刊、書籍、網路、以及媒體報導等。本研究是以戰爭型態的演進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新聞產製理論中的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戰爭中的媒體角色等相關文獻為分析的基礎。筆者期望能藉由本研究充實戰爭新聞學的相關文獻。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為：新傳播科技如何被融入與應用於不同時期的國際政治和軍事的衝突中？媒體在不同時期的戰爭中所採用的傳播科技對於軍隊與媒體的關係帶來了那些的影響？媒體在採用這些不同的傳播科技後，帶給人們觀看戰爭的方式有那些的改有變化？

本研究計分為六大單元，首先是前言；其次是相關文獻檢視；第三單元是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第四單元是廣播媒體的戰爭報導；第五單元是視覺影像媒體的戰爭報導；第六單元是討論與結論。

二、相關文獻檢視

本單元將首先檢視戰爭型態的演進與傳播科技的發展；其次，探討相關的新聞產製理論，並置重點於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論述；最後，則檢視戰爭中的媒體角色。

(一) 戰爭型態的演進與傳播科技的發展

Alvin Toffler 與 Heidi Toffler (傅凌譯, 2003) 在其所著《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 一書中，將戰爭的型態分為三波：農業、工業和資訊。俄羅斯的軍事理論家如斯利普琴科則以戰爭的起始年代、武器系統、主要能源、戰術和特點等，將戰爭型態的演進區分為六代：冷兵器、火器、近代火器、機械化、核戰爭和資訊化戰爭(詳如表一)(轉引自王凱, 2000: 4)。

表一：人類戰爭型態的演進

戰爭型態	第一代： 冷兵器	第二代： 火器	第三代： 近代火器	第四代： 機械化	第五代： 核戰爭	第六代： 資訊化
起始年代	奴隸、封建社會	17世紀	19世紀	20世紀	20世紀中葉	20世紀末葉
武器系統	刀、矛、劍、弓弩、拋石機	滑膛槍、鐵絲網	機槍、火炮、炸彈	戰車、飛機、無線電	導彈、核試驗	C4I系統精確制導、武器電磁化
主要能源	體能	物理能	化學能	熱能	核能	輻射能
戰術	方陣密集隊形、城牆、盔甲、重騎兵	線式隊形、堡壘防禦	散兵隊形、戰壕	閃電戰、總體戰	核威攝、靈活反應	空地一體、精確打擊
特點	主要依靠大規模集中人力	大規模人力與火力的集中	依靠火力的陣地攻堅	機動火力防護一體	大規模毀滅	控制資訊

資料來源：王凱(2000)，頁4。

Webster (2003) 將現代戰爭類型區分為兩種型式：工業戰爭 (industrial warfare) 與資訊戰爭 (information warfare)。工業戰爭的期間是從 1914 年至 1970 年代，1970 年代以後則屬於資訊戰爭。

Webster (2003) 指出，工業戰爭具有以下特色：大部份戰爭是發生於國與國之間，且大都屬於領土的紛爭；參戰國大部份或全部的人都被戰爭所動員；為了要維繫工業的生產與戰爭的需要，常採取準全國性的總體戰策略；通常需要徵召很多的年輕人來參與許多的戰役，也因此常造成大量的傷亡；為了整體的戰爭需要，政府常要接管許多的產業，如交通和能源等，而這些通常是經由軍事指揮官們來決定如何做最好的部署。

西方國家由於軍隊事務革命而激發了許多軍事科技方面的改變，如由衛星與電腦所掌控與導引的武器，使得戰爭的型態演變成資訊戰。資訊科技戰爭是融合控制 (control)、指揮 (command)、通訊 (communication)、電腦 (computer)、情報 (intelligence) 的 C4I 資訊化戰爭。

Webster (2003) 指出資訊戰具有六項特點：戰爭不再需要大規模的人力，而是轉移至所謂的「知識戰士」 (knowledge warriors) 來處理複雜與電腦化的武器裝備；戰鬥單位已轉變成次要角色，而由更專業化與科技化來取代；軍事武裝衝突是一種「即時性戰爭」 (instant wars) (Castells, 1996:454-461)，也就是說，正面的遭遇戰會很短暫，可能僅有數天或者數週之久；資訊戰並不需要很多的詳細計劃，而是需要嚴密的與彈性回應的計劃；減少平民對戰爭的參與，而依賴專業知識戰士；資訊戰注重國內與全球民眾的「感知管理」 (perception management)，因為民意是發動戰爭的重要支撐力，如果有反戰的聲浪出現，將可能會嚴重阻礙部隊戰力的發揮。

由以上對於戰爭的三種不同區分中可以瞭解到，斯利普琴科是從武器系統、主要能源、戰術和特點層面來加以區分，而 Toffler 與 Toffler 與 Webster 的區分則極為類似，兩者大都從戰爭的目的與性質、整體社會的動員程度等方面為考量。三種區分都共同的提到了最新階段的戰爭是屬於資訊化的戰爭，斯利普琴科提到了資訊控制的特點，Webster 則以「知識戰士」與「感知管理」等的概念來替代資訊的控制。

Mattelart (陳衛星譯，2005) 曾從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國際傳播的發展。他認為，其中交織著戰爭、進步和文化，以及三者間連續不斷的相互交錯軌跡。傳播首先是為了用來進行戰爭，而在戰爭以外的和平時期，儘管戰爭已習慣被作為傳播思想的盲區，但是除了激發出對傳播本身的研究與分析外，也將這種研究與分析的成果用於軍事。

以衛星傳播技術為例，本身是 1960 年代美蘇在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的產

物。同樣地，網際網路的發展是由美國國防部所研發的 ARPANET 而來，與軍事也有著密切的關聯。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由於民主自由集團與共產集團的對抗，為了軍事防禦與攻擊的需要，處處可以見到軍事與工業的聯合體，來共同研發新的傳播科技與武器，也因而打破了私人與公共、民用與軍用、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之間的隔離層面（朱振明譯，2007）。例如，美國政府曾大規模投資從事電子與航空研究和開發的公司，而這些公司就成為了電信傳播技術的搖籃。以 IBM 電腦公司為例，該公司在研發與製造全球第一台電晶體電腦的過程中，來自美國國防部的資金是其重要的財源（朱振明譯，2007）。事實上，比衛星更早出現的傳播科技，如電報與無線電廣播也與戰爭有著密切關聯。

Mattelart（陳衛星譯，2005；朱振明譯，2007）曾指出，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與 19 世紀後半期爆發的衝突有著密切的關聯。以電報為例，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不僅見證了穿越黑海的第一條海底電纜的鋪設，也見證了電報被架設於戰場、參謀本部與英法政府間。美國的內戰（1861-1865）則呈現了電報應用於軍事戰略的價值。波爾戰爭（1899-1902）與日俄戰爭（1904-1905）則分別說明了電報與無線電通信對於軍事的重要性（朱振明譯，2007）。因此，戰爭可以說是新傳播科技發展的激發者與主要採用者。

胡光夏（2004、2005）曾依照傳播科技的發展歷程，將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區分為：「平面媒體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戰爭報導）、「廣播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報導）、「電視戰爭」（越戰的報導）、「衛星與有線電視戰爭」（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電視直播戰爭」與「網際網路戰爭」（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此種區分主要是從媒體的類別與特性來加以區分，並且是從媒體採用傳播科技的歷程著眼，對於瞭解不同時期戰爭中的不同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與新聞產製，有很大的助益，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參考此一分類架構，將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戰爭新聞的產製區分為三個時期，即平面媒體、廣播與視覺媒體。

（二）新聞產製理論

傳統上，新聞產製理論可以分為四種：功能主義、現象學（phenomenology）、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chudson, 1991; Ferguson and Golding, 1997）。

功能主義是屬於行政性研究，認為媒體是一個大社會系統中的一部份，大多數的研究是採取內容分析或問卷調查法等量化的研究方法，少數則採取質化研究法如參與觀察法等。功能主義原先是採取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的概念，來探討新聞媒體的守門過程。在 1960 年代後期與整個 1970 年代期間，功能主義的傳統開始受到批判與質疑，不同的理論典範開始出現，而這些新出現典範的共

同特點是強調新聞「產製 (production)」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新聞是「製造」出來，而非如功能主義般強調是客觀存在，等著被媒體守門人來加以發現。

現象學、文本研究、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等三種研究傳統就是典型的產製理論，而這三種傳統已逐漸的取代傳統的功能主義 (Schudson, 1991)。Schudson (1991:150) 指出，「這三種研究方式……大幅增加我們對於媒體的瞭解，研究的重點是置於特定的媒體機構，以及這些機構對於文化產品的『新聞』的創作過程。」

現象學強調社會生活中的意義本質，主要在檢視新聞媒體在建構與傳播意義上所扮演的角色 (Tuchman, 1978)。文本研究則從新聞文本中探討產製的過程，分析新聞文本如何突顯某些特定的社會觀點，而忽略了那些觀點。

在這些新聞產製的替代性典範中，本研究分析架構是採取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論點。

政治的本質是權力 (power)、經濟是財富 (wealth)、傳播是知識 (knowledge)。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在檢視在知識產製與經銷的過程中，財富與權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財富與權力的產製與分配的過程中，知識所扮演的角色 (Norris, 1990:1, 10)。

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和其宏觀決策活動的政治經濟學思路來檢視傳播媒體及其傳播行為。

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源自於馬克思主義，以權力和階級為著眼，能夠提供檢視在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等情境中的不平等與不公義情形 (Murdock and Golding, 1977; Murdock, 1982;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Mosco, 1996)。

Golding 與 Murdock (1996) 指出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有四個特點：社會的變遷 (social transformation)、社會整體性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與實踐 (praxis)。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屬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間是一種雙向、互動與辯證的存在關係 (Sherman, 1987)。因此，歷史的分析是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一部份 (Bettig, 1996:1)。以本研究為例，傳播科技發展與戰爭新聞產製就被視為是整個國際與國內系統中的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受到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影響。

(三) 戰爭中的媒體角色

《德黑蘭日報》曾列舉了媒體在社會衝突中能扮演的角色有七種：無私的革命份子、整體性的組織者、煽動者與宣傳者、歷史的促成者、無畏的真理尋找者、議題的設定者、以及邪惡的操縱者 (轉引自 Frederick, 1993)。

方鵬程 (2007) 從西方媒體在戰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與政府或軍隊的關係，將媒體角色區分為 8 種：(一) 媒體是戰爭中的缺席者；(二) 媒體

作為戰爭報導的批評者；（三）媒體在戰爭中介入軍事決策；（四）媒體是革命的工具；（五）媒體被政府用作戰爭宣傳的工具；（六）媒體作為民意引導者與塑造者；（七）媒體成為外交談判與危機處理的輔助管道；（八）媒體成為軍隊中的一部分。

胡光夏（2007）將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區分為六種：戰爭的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動它國加入戰爭、情報搜集與決策的參考來源、戰爭工具與戰爭的平台。

Thussu 與 Freedman（2003:4）認為，主流媒體在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三：批判的觀察者（critical observer）、宣傳者（publicist）、以及近期的作為想像與執行戰爭的場地，也就是戰場（battleground）。

以美國媒體為例，所扮演的第一種角色（批判的觀察者）是採取敵對（adversarial）的模式。其主要的思考邏輯是，能經由記者的敏銳的觀察與調查報導，使政府在發動戰爭的理由能更為公開，且軍事行動也能更加透明。敵對的模式常會與越戰聯想在一起，特別是想到已退休的 CBS 名主播 Walter Cronkite 在越戰期間的報導。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談到電視報導越戰時就曾說：「報導戰爭中人們恐怖的遭遇與犧牲……其結果是嚴重的打擊前線的士氣，令人開始懷疑美國是否能在國內的團結一致下，來打擊海外的敵人。」（轉引自 Hallin, 1986:3）。

事實上，有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媒體在越戰期間從未扮演著真正批評者的角色，而是作為政府的宣傳者。如 Herman 與 Chomsky（1988）指出，媒體報導越戰排除許多重要的面向：美國的反戰聲浪、越南人民的想法、以及真正在衝突中的侵略者是美國而不是北越等。美國主流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是複製政經領導者的框架，僅作為宣傳的媒介，以及啦啦隊。McChesney 與 Nichols（2002）、Chomsky（2002）等人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啦啦隊媒體已加以批評。他們大都認為，市場導向的媒體偏好企業與媒體的聲音，而忽略了另類的聲音。McChesney 與 Nichols（2002）指出，為了動員民眾支持對流氓國家（rogue state）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的主流媒體不加以批判的接受和再製如「恐怖主義」和「自我防衛」等的界定，而一般人民被每日無意義的新聞徹底的去政治化。

第三種角色是指在現代的戰爭中，媒體與軍事網絡已融合為一。一方面，媒體已成為戰爭的戰場，正如 Toffler 與 Toffler（傅凌譯，2003：219）所說的：「為未來戰爭而苦苦思索的人都知道：明日某些最重要的戰爭，將在媒體戰場上進行。」；另一方面，媒體是一般民眾經歷戰爭的主要管道，因此兩者間是密不可分。

Thussu 與 Freedman（2003）認為，這種論點不是在強調媒體是否支持或者

是反對戰爭，而是媒體本身已經成為當代衝突的手段與工具。這種發展主要是經由兩組不相關的思潮與事情所構成的。首先，如後現代主義者 Baudrillard (1995) 所宣稱的，波斯戰爭是一種重大虛擬 (gigantic simulation) 的戰爭，人們是被電視影像所轟炸，而不是飛彈。其次是，科技的發展所促成的「軍事事務革命」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也就是戰爭的本質已逐漸成為科技化 (technologized)、資訊化 (informatized) 與中介化 (mediated)。美國國防部所積極促銷的「未來作戰系統」 (future combat system, FCS)，也就是所謂的資訊化戰爭，包括精靈炸彈 (smart bomb)、電腦化監控系統 (computerized surveillance system)、以及數位模擬 (digital simulation) 等。

從以上不同學者的分類中，可以瞭解到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可以從大的社會結構、戰爭的決策者、媒體與閱聽眾等不同的面向，來分別加以檢視，可以應用傳播理論中的規範理論⁸與媒體產製等作為分析的架構。

以本研究而言，因為是以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因此，是從媒體應對戰爭持批判的觀點來加以檢視媒體的角色與戰爭新聞的產製。

三、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

戰爭是人類社會的常態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有關戰爭的記載或報導可以區分為官方與民間。在現代報紙媒體出現之前，東西方有關戰爭的報導或記載主要是以官方為主。

東方歷史上最早有關戰爭的文字記載是，發生於大約西元前 2698 年的涿鹿之戰，當時黃帝部落利用地形，誘敵深入，打敗了南方的蚩尤部落 (馬劍，2004)。西方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出現於西元前 1469 年，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在巴勒斯坦的麥吉多山口，運用「戰車部隊」擊敗叛變的部落 (倪樂雄，2002)。早期這些東西方有關戰爭的文獻記載，比較像是官方歷史或野史的記載，並非是屬於具有時效性的媒體戰爭報導。

西方比較具有時效性的戰爭報導，大約出現在西元前 50 年。當時的羅馬大帝凱撒 (Gaius Julius Caesar) 曾下令在議事廳外與羅馬城內的顯眼處，張貼《每日紀聞》 (act diuran)，其內容包括官方通告、戰爭、宗教和競技等，主要是手抄本，但數量相當有限 (李茂政，1999；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儘管《每

⁸ 規範理論主要在探討，為了廣泛的公共利益或社會整體的福祉，媒介應如何運作或者人們期待媒介應如何組織。也就是強調所渴望的媒體結構與表現。結構方面所關切的是國家給與媒體多少的自由或者是媒體通道的多樣性。表現是指媒體選擇資訊或娛樂報導的態度。

日紀聞》屬於官方的報導，且內容包羅萬象，但其型式已具有平面媒體報導的雛型。

由於羅馬時期的凱撒大帝，在征戰之餘，還肩負著報導戰事的職責，因此，有人尊稱他為戰地記者的始祖（聞亦道，2003）。凱撒自己曾撰寫了《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s*），描繪西元前 58 年至 49 年間，出師遠征高盧（古代法蘭西），凱旋回到義大利的經過（倪樂雄，2002；崔蕙萍、鄭曉村譯，1984）。早期這些有關戰爭的報導還包括 Thucydides (471-400BC) 的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與 Arrian (96-180AD) 的 *Anabasis Alexandri* 等（倪樂雄，2002）。

基本上，在 Crimean 戰爭（1853-1856）之前，西方報導戰爭的成功或失敗的訊息，主要是由參戰官兵以作為「官方的目擊者」（official eye witnesses）來加以撰寫。因此，此類報導比較像是官方的歷史記述，通常在內容上會強調勝利，而對於失敗則予以藐小化處理（Taylor, 2003）。

平面媒體報導時期與「新傳播科技」運用與新聞產製較為有關的戰爭有四個，包括克里米亞戰爭、美國內戰、美西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依序加以探討。

（一）克里米亞（Crimean）戰爭

一般大都認為，克里米亞戰爭⁹（1853-1856）是開啟平民報導戰爭的重要先例。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新聞產製中，最受到矚目的傳播科技運用是電報與近代攝影術。

電報是在 1837 年由英國人 William Cooke 與美國人 Samule Morse 分別在自己的所在地加以發明（陳衛星譯，2005）。1851 年連接英國與法國的第一條海底電報電纜正式接通。在電報發明之後，英國與法國主要是將電報作為與殖民地的聯繫工具。然而在 Crimean 戰爭爆發後，原先為爭奪殖民地而爭峰相對的英國與法國，為了阻止俄國向西擴展，威脅兩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於是透過英國鋪設在黑海海底的電報線路來交換情報（Thussu, 2000；陳衛星譯，2005）。

克里米亞戰後，1866 年橫跨大西洋，連接英國與美國的一條海底電纜接通。迄 1868 年止，海底電報電纜的鋪設已遍及北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與波斯灣等地區（Thussu, 2000）。此後，電報不只在傳播通訊上發揮了快速的傳遞特性，

⁹ Crimean 戰爭是俄國對抗土耳其、法國、英國和薩丁尼亞聯軍的戰爭，兩軍在俄國南部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對峙長達一年，造成了 70 萬人死亡，英國的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曾組織護士隊伍加入遠征軍。

也對商業和軍事有著重大的意義。Headrick (1981:163) 曾說，這些電報電纜是帝國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Mattelart (陳衛星譯，2005) 也指出，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需要電報來與軍隊聯繫，因此，可以說電報發明的第一個用途就是用於軍事目的。此一戰役也是人類首次運用電報來報導戰爭的戰況 (胡懷，1995)。

克里米亞戰爭是「電報」首次在政府決策與新聞媒體報導上發揮驚人影響力的戰爭，同時，也使得戰爭報導的公共面貌產生改變。此一戰爭中最受到矚目的記者是英國《時報》(The Times) William Howard Russell，他是現代戰地記者的先驅者之一。

Russell 經由報社編輯的指派，報導英國遠征軍參與戰爭的表現。他從戰地所傳送回英國倫敦的報導，揭露了英軍裝備的缺乏與領導力不足、戰爭死傷等問題，震撼和感動了英國民眾 (Young and Jesser, 1997; Taylor, 2003; 程之行，1995; 周俊雄，2004)。由於他的報導充份曝露了英軍與政府的缺失、疾病與大膽盲進等，是造成戰爭失敗的主要因素，因而促使英國輿論要求政府相關部門要立即改進這些缺失。Russell 的戰爭報導被一些人士指控是協助敵國「顛覆英國政府」(Knightley, 1975; Furneaux, 1964; Mathews, 1957)。

Russell 的克里米亞戰爭報導埋下了日後軍隊與媒體間互動的潛在緊張關係，也就是平民記者的戰地報導不僅是危險的，且是不可靠的。而英國軍方也萌生對於媒體的管制 (censorship) 是確保媒體與公眾支持戰爭的一個重要途徑的想法 (Taylor, 2003)。自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軍隊大都會以避免有價值的軍事情報落入到敵方，進而危害到軍隊任務遂行與官兵安全為由，來進行一些「安全審查」(security review)。

而在此一戰爭中，英國攝影師 Roger Fenton 被准許可以搭乘載有移動式暗房的馬車到戰場拍攝戰場的情景，開啟了利用近代攝影術，將戰爭景像帶給民眾的先趨 (傅大為，2003)。而英軍以不要使官兵家屬感到害怕為由，要求他應小心謹慎地避免在照片中呈現出恐怖的戰爭場面，結果在其所拍攝的 360 多張照片中所呈現的戰爭景像，就如同是一場野餐 (傅大為，2003; 陳衛星譯，2005; 胡光夏，2007)。

這種人為擺設所拍出來的照片與後來《時報》記者 Russel 的報導截然不同。Russel 描繪了在 1854 年 10 月 25 日發生在 Balaklawa 的戰役與殺戮，當時有 400 至 600 百名英國騎兵在被派遣去攻擊俄軍大炮陣地時喪生，使得國會和輿論遭受前所未有的刺激。於是在 1856 年 2 月，英國軍方最高當局決定對於新聞自由加以限制，規定前線報導必須要有軍方派遣的人員參與 (陳衛星譯，2005)。

(二) 美國內戰

美國內戰於 1861 年 4 月 12 日爆發，於 1865 年 4 月 9 日結束。在 3000 多次

的交戰中，戰爭死亡總數達 50 萬人，其中有半數是死於生病或疾病。美國內戰死亡總數超越從獨立戰爭（revolutionary war）到越戰的總和（胡光夏，2007）。

1861 年至 1865 年美國內戰期間，電報在戰爭與新聞報導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國內戰期間，在 500 個城市中，總計鋪設了 5 萬多哩的電報線，其中軍用電報線有 1000 多哩（李恭蔚，2000）。整個內戰期間，經由電報纜線總計發送了 650 多萬封電報（Thussu, 2000；陳衛星譯，2005）。此次戰爭是美國國內最早得到廣泛性報導的戰爭之一，也首創了美國與歐洲記者共同合作蒐集新聞的範例。

在內戰期間，攝影師也開始出現在戰場（Thussu, 2000）。內戰是美國第一個經由攝影記者（photojournalist）¹⁰所密集報導的戰爭。然而，由於當時的報紙尚未發展出影像的印刷科技，因此，是採用木刻版來呈現影像。戰爭對於報紙的銷路有著很大的助益。北方報紙在報導中含有戰爭的資訊，在銷售量上可以增加 5 倍，而南方報紙則可增加大約 1/3 的銷售量（<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美國內戰宣告戰地記者（field reporters）時代的來臨。電報與相機是主要媒介工具。戰場上充滿著記者與攝影師，北軍有超過 500 名的戰地記者在戰地採訪，南軍則大約有 100 記者。戰地記者的主要配備包括馬匹、小望眼鏡、筆和紙。由於戰爭資訊主要是靠電報來傳遞，因此，報社挑選記者的標準主要是以能否操作電報，而不是寫作的的能力。電報是採用摩斯（Morse）碼來傳送。採用電報來傳遞新聞的費用相當昂貴，以 *The New York Herald* 為例，在整個內戰的報導上總計花了將近 1 百萬美元（<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在美國內戰爆發前，相機已出現 20 年，但影像處理的過程極為繁瑣。一位攝影師需要一輛輕便馬車來裝載攝影的裝備，包括相機、三腳架、相機化學用品、玻璃板與暗房等。由於相機在捕捉畫面時，需要較長的曝光時間，因此，無法捕捉到動態作戰影像，且只要有稍為移動就會產生影像模糊或重疊。美國內戰的歷史能夠呈現出來，主要是因為有相機的緣故。相機帶給民眾第一手畫面，並不是在戰鬥的當下，而是在接戰後的恐怖景象。攝影已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記錄歷史與報導戰爭的工具之一（<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儘管在內戰中已有許多的攝影記者的存在與活動（曾恩波編著，1975），然而 Mathew Brady 卻被認為是內戰中最偉大的攝影師。他獲得當時國會（congress）的許可去拍攝戰爭。他所雇用的攝影師總計拍攝了 3500 張戰爭的照片。美國政

¹⁰ 事實上，在當時的英文字典中「攝影記者」（photojournalist）一詞並未出現。

府在 1874 年以 27,840 元加以收購，目前這些照片存放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事實上，Brady 很少自己親赴戰地拍攝，而是在 35 個地點設置定點的拍攝場所，再派遣其所聘請的攝影師來加以拍攝。他也從其他的攝影師手中採購了 300 多張的戰爭照片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基本上，美國內戰就如同英國克里米亞戰爭一樣，開啟了軍隊與媒體間的衝突與不信任歷史。在內戰期間，軍方將領對於媒體是採取敵視的態度。以 William T. Sherman 將軍為例，他就曾表示：「我討厭報人。他們來到軍營，收集軍營中的謠言，然後就把當它當成事實加以報導。我將他們視為是間諜，事實上，他們就是間諜。如果我將他們全都殺光，在早餐之前，也會有來自地獄的新聞。」（轉引自胡光夏，2007：115）。（往前移）

美國內戰是首個真正透過媒體報導，而獲得國際支持的戰爭（Young and Jesser, 1997）。在內戰中，美國也首次發展出雙重媒體管制系統——新聞審查和接近戰場採訪資格的審核，來限制媒體活動。這些新發展出來的媒體管制措施，在後來的戰爭中持續不斷的被複製與修正（Hallin, 1997）。

Young and Jesser（1997）就曾指出，美國內戰對媒體的最大影響是，奠定了審查與非直接政治與軍事管制的形式。

（三）美西戰爭

美國黃色新聞戰爭的最高潮是發生在美西戰爭期間（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而這也是媒體扮演鼓動戰爭的角色中最常被提及的例子。然而，Frederick（1993）指出，Hearst 只是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人士之一，而這些人覺得有必要逼迫 McKinley 政府在海外建立基地，來與英、法與德國等國競爭。

當時的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政府於 1896 年指派 V. Weyler 將軍擔任駐古巴最高指揮官，他採取高壓手段來統治古巴殖民地。當時紐約的一些報紙已在古巴派駐特派員來採訪新聞，由於 Weyler 採取高壓手段，使得美國不少記者遭到逮捕，其中甚至有一名記者被殺害，因而引起美國報界的公憤（程之行，1995）。

美國 *New York Journal* 擁有者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派遣了一位記者和一位著名的漫畫家 Frederic Havane 到哈瓦那。漫畫家在抵達後，以電報向報老板表示：「沒有什麼要說的，一切都很平靜。可能沒有戰爭。我想回來。」Hearst 回覆說：「請你留下來。你提供漫畫，我提供戰爭。」（轉引自陳衛星譯，2005：23-24）。後來，在 Hearst 等黃色報業集團的鼓吹和誇大的報導下，主張和平政策的美國總統 W. McKinley 因受到媒體輿論壓力，終於在 1898 年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古巴，正式爆發了美西戰爭。

在美西戰爭爆發後，Hearst 曾親自帶著一批人，租用一艘 *Sylvia* 號的船前往

古巴的 Sandiago 與 Guantanamo 港。他自己也充當戰地記者，撰寫了一篇〈戰地目擊記〉，刊載於 1989 年 6 月 29 日的 *New York Journal*。Hearst 也報導了當時擔任輕騎兵指揮官，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 Theodore Roosevelt 的英勇作戰訊息（程之行，1995；周俊雄，2004）。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線電報電纜持續在國際間鋪設，使得跨國間的訊息傳播更為便利。例如，1902 年完工的第一條穿越太平洋的電纜線路，在 1904 年至 1905 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不僅提供了軍事情報的傳遞，也協助傳播了戰爭的報導（Thussu, 2000）。

19 世紀末期所出現的新傳播媒體是電影媒介的誕生。重要的發明者是 Thomas Alva Edison。他在 1893 年於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展示第一架電影放映機「西洋鏡觀影機」（kinetoscope）。隔年，他在紐約百老匯展演了由活動攝影機（kinetograph）所拍攝的默片，但當時的放映機重達一噸（梅長齡，1982）。1895 年，被尊稱為「電影之父」的法國兄弟 Louis 與 Auguste Lumiere 發明了一種電影機（cinematograph），才正式向世人宣告電影的誕生（張廣智，2000）。這些電影技術的發展，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新聞影片（newsreels）拍攝的基礎。

在 20 世紀初期，傳播科技的最大突破是無線電波的發展，使得電報的傳遞從有線逐漸轉變成無線，同時，也促成日後無線電廣播的出現。

無線電是義大利人 Guglielmo Marconi 所發明，剛開始是被用來作為像船隻對海岸等電纜無法完成的通訊上。由於義大利政府對於 Marconi 的發明毫無興趣，因此，他在 1896 年前往英國發展。1901 年他在大西洋上成功的傳送訊號，證明了無線電通訊可以取代電纜的可行性（Fortner, 1993）。1902 年，他在英國海軍部門與報業集團的支持下，首次實現了橫跨大西洋兩岸的無線電報傳送（陳衛星譯，2005）。

儘管收音機廣播在 1910 年已初步試驗成功，且美國西屋公司在 1915 年已開始製作廣播節目，但廣播媒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仍未普及。美國一直到 1920 年由西屋公司在賓州匹茲堡設立第一個商業電台 KDKA，才帶動廣播事業的快速發展（侯志欽、劉新白，199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間的一項新傳播科技發展與運用是愛德華·培林發明了培林式傳真電報機，此項發明採用電報線來傳送印刷，使得報紙可以刊登在任何地方所拍攝到的照片（段慧敏譯，2005：9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報紙還沒有其他新的傳播媒體作為其競爭對手。在整個戰爭期間，動畫的新聞影片（newsreels）已被密集的運用，而資訊可以透過

有線或無線電報來傳送。在新聞攝影方面，遠距鏡頭已出現，最遠可以拍攝到600碼左右的距離。新的 De Proszynski Aeroscope 動畫攝影機已不需要三腳架即可拍攝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參戰國的媒體要在前線採訪是困難重重，因為政府、報紙與記者都會先做審查。在戰爭初期，英、法、德軍都曾下令逮捕在前線的記者。以英國為例，僅有2名獲得政府許可的攝影記者可以在戰地拍攝，如果未獲核准私自前在戰場拍攝則可能會被處決。英國為了阻止德國通訊，在1914年8月5日將德國大西洋的電報線切斷，使得要傳遞到美國的訊息都要繞經英國，且經過審查與編輯後，才能收到相關的新聞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美國雖允許戰地記者在前線採訪，但必須先獲得政府的核准，且要遵守嚴格的規範。報紙不僅要保證該報記者是一位媒體紳士 (a gentleman of the press)，且強制要購買1萬元的戰爭債券作為背書。至於戰地攝影只有獲得戰爭部 (War Department) 同意才可以在戰地拍攝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總結，在平面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中，由於電報的出現，加快了戰爭新聞傳遞的速度，再加上近代攝影術的出現等，對於戰爭的決策者與執行者產生了威脅，一方面擔心媒體的報導會洩露軍事機密，另一方面則憂慮媒體的戰爭真實報導可能會帶來民意的壓力，進而阻礙戰爭的進行，因此，各國逐漸萌生與發展出限制媒體採訪的管制思維與措施，以及利用媒體作為戰爭工具的具體作法。

四、廣播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

以廣播媒體作為主要報導媒介之一的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韓戰，以下分別加以檢視。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廣播新聞學的年代，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是廣播戰爭。事實上，廣播戰有兩種意涵：一種是透過無線電廣播來進行心理戰與宣傳戰，也就是將廣播作為一種作戰工具；另一種則是透過無線電廣播對於戰爭的即時報導，也就是將廣播作為新聞報導的媒介。

1. 廣播媒體作為戰爭的工具

從廣播誕生之日起，就與宣傳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成為廣播發展的一部分 (胡光夏, 2005)。許多國家與政府都利用其威力去影響人們的價值觀、態度與信仰 (Hachten, 1992; Taylor, 1995)。

德國希特勒宣傳部長戈貝爾深信廣播作為一種傳播工具的威力，他曾說過：「真正的廣播就是真正的宣傳。宣傳意味著在思想領域的所有戰鬥，包括無中生有、複製、消除、建立和毀滅。」（轉引自 Hale, 1975:2）。Martin（1980:274-275）也曾表示：「廣播是國際政治宣傳者最為理想的工具。隨著無線電的發明，再加上廉價的收音機，國際政治宣傳者可以任意地對他們的目標聽眾傳達他們想要表達的話語，而不用擔心會受到地理空間或者是其他國家的箝制。」由此可見，廣播可以被用來形塑國內的公共輿論，也可用來動員盟國加入戰爭，並且展開對敵作戰（胡光夏，2005）。

歷史上最早記載運用公共廣播來作為意識型態鬥爭工具的是蘇聯共產黨。列寧於 1917 年 10 月 30 日透過無線電廣播其推翻俄國沙皇的演說。而蘇聯也是最早運用無線電短波來爭取國際聽眾的國家之一，其短波廣播是於 1925 年由莫斯科發出，目的是要向支持者和反對者解釋他們的革命（Head, 1985; Thusu, 2000）。基本上，在 1920 年代中期之前的國際廣播訊號的出現是零星的，而不是常態性（Fortner, 1993）。

國際廣播受到各國的重視是在 1920 年代末期以後。根據現有的資料，荷蘭和蘇聯被認為是最早進行密集國際廣播的國家，兩國大約在 1927 年開始進行。Browne（1982）認為，荷蘭是第一個建立國際廣播的國家，而蘇聯則是第一個體認和利用廣播在意識型態上的重要戰略工具的國家。

隨著荷蘭和蘇聯之後，其他國家也陸續展開國際廣播的活動，特別是在 1930 年代。如 1929 年的「德國電台」（Deutschlandsender）、1931 年「法國電台」（Radio France）、1932 年「英國帝國廣播電台」（BBC Empire Service）、1934 年「日本電台」（Radio Japan）（Fortner, 1993）。廣播被運用於國際政治宣傳的輝煌時期之一，是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間（Fortner, 1993）。

對於 1930 年代在國際上競相利用廣播來從事宣傳活動的現象，Fortner（1993）將之這形容為「廣播戰」（radio war）時期。這期間最著名的是德國，Martin（1980:280）曾將該國描述為「基本上是宣傳的產物：是第一個發展國際政治宣傳和投入龐大資源的宣傳組織。」德國納粹政府特別成立政治宣傳部（Propagandaministerium）來策劃所有的宣傳活動，希特勒（Hitler）與其宣傳部長戈貝爾都相信，廣播可以激發德國人民為國犧牲，同時也可以在戰場上打擊敵人的士氣（Fortner, 1993）。

英國的「帝國電台」（BBC 的前身）成立於 1932 年，此一電台開辦的目的是要將英帝國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屬地聯結起來，其資金的來源是英國外交部，節目內容以反映英政府的外交公共政策為主（Thusu, 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39 年開始，期間，交戰國雙方都積極利用國際廣播來

從事宣傳。以播出的外語廣播節目種類而言，納粹德國的 26 種最多，依次是義大利的 23 種、法國的 21 種、蘇聯的 13 種、英國的 10 種（Fortner, 1993；胡光夏，2005）。

日本的廣播主要是由日本廣播協會（NHK）創辦的短波廣播，傳送至東南亞、東亞和美國西海岸（針對日裔美人），以及太平洋島嶼上的美軍，其播送的宣傳節目如「Zero hour」（Wood, 1992）。

英國主要是由政府所屬的 BBC 來進行，使用的語言除了英語外，還包括法語、德語、西班牙、葡萄牙語等 7 種外國語（Walker, 1992）。在戰爭結束時，其廣播語言已達到 39 種（Thussu, 2000）。儘管英國在戰爭中一再宣稱，英國 BBC 的內容是「公正獨立」的立場，但學者 Curran 與 Seaton（1997:147）卻指出，「這只是英國自我吹捧神話的一部分」。

美國則一直到 1942 年「美國之音」（VOA）開播以後，才有了國際廣播來增進自身的政治利益。

2. 廣播作為戰爭報導的媒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廣播已是一種普及的傳播媒體，民眾依賴廣播來獲知戰場的訊息，而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只依賴報紙與新聞影片。

廣播提供了戰場的即時現況報導，民眾可以第一手的聽到英國倫敦被德軍轟炸、羅斯福總統的爐邊廣播談話、德國投降與杜魯門總統宣佈危機已解除等訊息。

在廣播的戰爭新聞報導中，最令人矚目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 Edward R. Murrow 在英國倫敦的現場直播。他開創了戰地現場直播與連續廣播報導等口語形式的廣播。1940 年，他將倫敦受到德軍空襲時的爆炸聲，透過廣播加以直接呈現，也可以使民眾迅速瞭解到戰爭對英國都市民眾的影響。他在每一節廣播的開場白——「這裏是倫敦」，已成為著名的語詞（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周俊雄，2004）。

事實上，Murrow 在與主管媒體採訪的英國資訊部的交涉過程是非常獨特的。他在德軍密集轟炸英國倫敦時，想要尋求為美國 CBS 的廣大閱聽眾做現場廣播，但此一請求起先被英國加以否決。他仍持續的努力，最後終獲英國政府同意，可以先做一些排練，而他也想辦法向英國政府證明他不會洩露重要軍事機密（Sperber, 1986）。英國政府後來終於慢慢的瞭解到，由於 Murrow 的報導使得英國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想要美國來協助英國作戰的目標終於能達成（Woodward, 1993）。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Murrow 從英國倫敦的廣播直播令人印象深刻，

但當時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¹¹，再加上無法保證播音的質量，因此，通常都由電台記者將聲音稿先傳回總部，經由編輯後再播出（周俊雄，2004）。

在 1930 年代，美國的貝爾（Bell）實驗室已成功研發出透過電磁波來傳送照片的技術，使得照片的傳送速度加快。曾因拍攝硫磺島美軍士兵豎起美國國旗，而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美聯社記者 Joe Rosenthal 就是透過美聯社關島分社的電傳設備，將照片傳送回紐約總社（周俊雄，200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新聞影片不再是默片，已有聲音，透過報導民眾可以知道德國集中營的實際情況（<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運用剛成立 160 天的 WCBW 電視台，花了約 9 個小時時間，製播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新聞（周俊雄，2004），儘管設備與技術均較為簡陋，但奠定了日後電視新聞報導的基礎。

（二）韓戰

第二次大戰之後，全球的國際政治局勢可以分為冷戰與後冷戰兩個時期。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在局部地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勝利的同盟國，在戰後因相互對立的意識型態（共產主義 vs. 資本主義），分成由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線和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集團展開對抗，全球進入了冷戰時期。這段期間，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所爆發的戰爭中，較受到媒體矚目的有韓戰與越戰。本單元先針對韓戰進行探討，越戰則在視覺影像媒體與戰爭報導的單元中加以論述。

電視媒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進行研發，但受到戰爭的影響而暫時終止。在韓戰（1950-1954）爆發時，電視機已出現，但全美的數量少於 1 千萬台，且主要集中在紐約地區（周俊雄，2004）。1953 年彩色電視機才正式問世（郎玉衡，1990）。

因此，韓戰是美國所參與的主要衝突中，最後一個以平面媒體與廣播為主宰報導的衝突事件。

韓戰對於大多數的戰地記者而言，是一個非常令人沮喪的採訪經驗。因為戰場是流動的，對媒體而言，沒有固定的場所可以提供現代的傳播設備。在南韓的 Taejon 有一棟建築提供記者使用，媒體記者的吃、喝與工作都在此一建築，只有一條電話線可以連接到東京，因此，沒有獨家新聞可言。此外，也沒有暗房的設備，攝影師必須將影片傳送到日本沖洗。由於衛星等立即傳送設備尚缺乏，因此，無法做現場的報導。民眾所見到的戰場場景是透過政府所提供的影片。在戰爭後

¹¹ 由於當時的錄音設備有 40、50 斤重，對記者與播音員而言，非常的累贅，不利於在戰場上移動。

期，軍方的通訊單位才架設了兩部 radio teletype 的機器，可以將訊息在兩小時內傳送到日本東京（<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五、視覺影像媒體的戰爭報導時期

在冷戰時期，一些由英美等國所發動的戰爭，也受到媒體的關注，如 1982 年英國與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1983 年美國入侵格瑞納達、1989 年 2 月美國入侵巴拿馬等，由於這幾個戰爭開啟了軍方對於媒體的新管理措施，相關的戰爭報導受到極大的限制，傳播媒體空有現代化的傳播科技，但無法發揮報導功效，因此，不在本研究的探討範圍內。本單元僅探討最具代表性的越戰。

1989 年至 1991 年間，隨著東歐共產國家產生劇變、蘇聯的解體，使得東西集團的對抗結束，全球進入後冷戰時期。後冷戰時期主要局部性的戰爭大都由美英兩國所發動的，才會受到國際媒體的矚目，這些戰爭包括 1991 年第一波斯灣戰爭、科索夫戰爭、阿富汗戰爭、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等。在這些美國所介入的軍事衝突中，最受到國際媒體矚目的戰爭是兩次的波斯灣戰爭。以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為例，具有以下幾個特色：有史以來媒體的報導量最多、媒體記者犧牲的比率最高、戰地記者最多、電視媒體與網際網路的戰爭報導等（胡光夏，2003、2007）。因此，本研究僅針對這兩個戰爭加以探討。

以下依序針對越戰、第一次與第二次波斯灣戰爭，逐一加以檢視。

（一）越戰（1964-1975）

儘管美國一般民眾在韓戰期間，已能透過電視接收戰爭的訊息，但電視在韓戰的報導中扮演著較微不足道的角色。越戰是常被提及的第一個電視戰爭。而越戰的電視新聞報導，特別是晚間新聞期間，是第一個受到持續好幾年報導的衝突。越戰也是第一個在報導上受益於科技進步，特別是美國電視網首度將新聞變成為半小時型式之際，透過衛星，使報導更具即時性（Carruthers, 2000:108）。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電視已極為普及。廣播與電視會定期將越戰的相關報導內容直接傳送到美國家庭的客廳中，美國作家 Michael Avlen 將此一現象稱為是「客廳的戰爭」（The living room war）（轉引自胡光夏，2007：98）。McLuhan 與 Fiore（1968:134）就曾指出這種電視或客廳戰爭（TV or living-room war）的特色是，「民眾現在是參與所有戰爭的階段，而主要的戰鬥就是在美國人的家中進行。」

由於手提 16mm 攝影機的出現，再加上音響設備輕巧，使得電視新聞工作人員可以到任何想到的地方。記者在戰地所拍攝到的影片，經由飛機傳送到美國本土，再經過處理與編輯後，在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或數天內就能傳送給閱聽人

(Gerbner, 1992:245)。

在越戰的高峰期，全美有超過 1 億台電視，1965 年美國三大電視網 ABC、CBS、NBC 已將節目內容全部以彩色播出，然而在 1969 年時全美僅有 1/3 用戶擁有彩色電視機。美國各電視台為了提供較多的新聞內容，將主要晚間新聞播出的時間，特別由 15 分鐘延長至 30 分鐘。新聞影片 (Newsreels) 已消失了，電視也取代了廣播與報紙，成為民眾獲知戰爭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 (<http://www.newseum.org/warstories/technology/flash.htm>)。

衛星科技的出現，對於新聞的傳送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但在越戰期間仍屬於萌芽期。1970 年代中期的 ENG (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是電視媒體的一項採訪設備的突破。ENG 雖然仍無法突破地域的限制，但使得後來利用微波電訊與衛星傳送新聞實況成為可能，也開啟了電視新聞進入分秒必爭的年代 (周俊雄, 2004)。1975 年美國 RCA 發射了第一顆用來傳送電視節目的衛星。衛星技術的發展，在 1980 年代中期，出現了 SNG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的攝影機，使得記者可以做即時的連線報導，充份展現了新電子傳播科技的時效性與臨場感。而衛星科技的引入也象徵新聞學即將進入數位年代。

比起過去的戰爭，越戰戰地記者更容易前往戰場採訪。記者只要持有有效的護照、注射證明與媒體的一封信，就可以獲准採訪，使得戰場上，隨處可見到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 (胡光夏, 2007)。軍方對於媒體採取極為寬鬆的開放立場，在北越利用 Tet 假日違反停火協定進行攻擊後，才開始轉變 (Cate, 1998)。

隨著媒體大量報導美軍傷亡的消息，特別是透過電視媒體的報導，活生生的將戰爭畫面帶到美國民眾家中，間接促成美國國內反戰活動的盛行。保守人士指責媒體是戰爭的惡棍，造成民心瓦解，導致作戰失敗，而自由派人士則讚美媒體是英雄，報導政府對民眾隱瞞真相的企圖與方式 (Hallin, 1997)。而軍方則開始責怪媒體未對前線加以支持，並將媒體視為是戰爭勝利的破壞者 (Cate, 1998)。後來軍方逐漸形成共識，將越戰失敗的原因歸之於當時的電視媒體報導。因而有「戰爭加上生動的電視報導就是等於失敗」之類的看法 (Carruthers, 2000:146)。而這也埋下了軍方尋求在未來軍事行動中有效規範媒體的想法與作為。

美軍從越戰中所獲得的啟發主要有二：首先，如果在己方的反戰意識日漸高漲，就會帶來要終止戰爭的政治壓力，而戰爭也就會失敗。其次，電視的影像有能力來提升反戰的意識，以及干擾合法武力的使用，甚至是政府的正當性。電視的立即性會帶給閱聽眾負面的印象與情緒 (MacArthur, 1993: 82)。

(二)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傳播科技的發展，如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特別是數位廣播與電視的運用，使得全球性的新聞電視頻道，才得以出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在 1980

年代以提供全世界全天候 24 小時新聞，來服務全球的閱聽眾，是國際電視新聞傳播的一項主要創新 (Hachten, 1992)。儘管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前，CNN 在過去的幾個事件如 1989 年北京天安門事件、舊金山大地震、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事件等的報導吸引著全世界的焦點，但真正奠定其全球電視新聞霸主地位的是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軍事行動代稱是沙漠風暴) 是第一個真正全球主要的媒介危機報導事件，透過 CNN 的報導，造就了「瞬間歷史」 (Gerbner, 1992: 247) 與全球第一個「同一時間」 (real time) 的戰爭 (Bennett, 2003; Thusu, 2003; Boyd-Barrett and Rantanen, 1998; Volkmer, 1999)。CNN 記者 Peter Arnett 從巴格達 (Baghdad) 傳送在伊拉克的採訪報導，而其他的 CNN 記者則分別從美國華盛頓和沙烏地阿拉伯傳送美軍和聯軍的相關新聞 (Altschull, 1995)。美國媒體分析家 Johanna Neuman (轉引自吳福生譯, 2001: 333) 就曾表示：「觀眾均能目睹戰爭的進行；柴契爾夫人、葉爾辛總統、布希總統、夏米爾總理，分別在倫敦、莫斯科、華府和耶路撒冷觀看；即使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也在他所設於的黎波里的帳篷觀看。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在戰爭爆發後的前兩個月，CNN 的 24 小時報導型式與其致力於報導幾乎是享有全球性的獨家。CNN 的戰爭新聞報導已創下全球的記錄，對於當代電子新聞學的發展趨向有著顯著的貢獻 (Vincent, 1992)。據指出，CNN 在報導危機上就已花了 1500 萬美金，而這樣的支出也已獲得代價 (Vincent, 1992)。CNN 所建立起的 24 小時新聞網，現在已居於世界新聞的領導地位，並且「已改變了國際新聞體系，特別是在國際危機與衝突之際。」 (Hachten, 1999:151)。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由於透過 CNN 的實況 (real time) 報導，將第一手的戰爭訊息即時的傳送至全球各地的家庭中，因而，曾引起廣泛的討論，被形容為 CNN 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電視新聞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現象 (Cohen, 1994:9)。儘管如此，有學者 (Cohen, 1994:9) 卻認為，並不是由於 CNN，而是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電視本身成為「媒體與外交政策方程式」 (the media-foreign policy equation) 的一股重要力量。事實上，早在越戰期間，電視就已顯露了其在政府外交與軍事決策上的重要性。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主要是由電視新聞以一種視覺影像 (videographic) 型式的再現所主導。Caldwell (1995:5) 稱之為「電視視覺」 (televisuality)，是指運用各種不同的外在形式來加以呈現。例如，新聞主播與邀請來賓談話等，而這是一種所謂的「CNN 形式」 (CNN look) (Bolter and Grusin, 1999; Hoskins, 2001)。

基本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是美國在越戰後，首次建立機制化新聞審查機制

的戰爭。而全國媒體聯合採訪系統的成立¹²，使得軍方得以限制新聞記者的移動與接近戰場，再加上「沙漠風暴行動」¹³剛開始主要是以空戰為主，戰爭的本質限制了媒體接近戰場，也有利於軍方對資訊的管制（MacArthur, 1993; Hallin, 1997; 胡光夏, 2007）。Keeble（1997:81-96, 93-107）認為，媒體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為政策目的服務的方式有二：首先，在報導中要將歷史加以排除¹⁴；其次，只選擇軍方的陳述作為政策的辯論。

（三）第二次波斯灣戰爭

電視新傳播科技的發展，從可攜帶式衛星傳送器材到可移動式衛星訊號傳送，使得2003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報導進入了現場（live）直播。在展開地面戰的初期，CNN將衛星轉播設備SNG直接架在戰車上，將戰爭的場景隨著美英聯軍部隊的推進，立即實況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CNN的一位主播曾用戒慎恐懼聲音旁白警告觀眾說：「以下的畫面將出現什麼內容，我們無法預測，如果有猝不及防的可怕畫面，請觀眾要有心理準備。」（轉引自《中國時報》，2003，0325：第10版）。儘管如此，這些「嵌入」¹⁵（embedded）在美軍前線部隊的CNN記者，並沒有真正呈現出戰爭的恐怖與殘酷景像的畫面。

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大約有1400名記者參與戰爭報導，而在2003年則有5000名記者。在CNN主宰國際新聞報導12年之後，全球閱聽眾在2003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有著各式各樣的國際媒體通道，包括電子報、透過網路的廣播與電視、印刷媒體與24小時電視新聞報導等（Al-Kindi, 2004:334-335）。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使得CNN獲得國際名聲的歷史再度重現，但2003年獲得國際矚目的卻是阿拉伯的半島電視台（El-Mawawy and Iskandar, 2003:41；胡光夏, 2003；黎瑞剛等譯, 2006）。

2003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為網際網路新聞市場競爭與發展帶來了契機（胡光夏, 2004）。這次戰爭是歷史上第一次網際網路真正參與報導的戰爭，也是標誌著首次的「網路戰爭」（internet war）報導（Bergman, 2003, May 5；Glaser, 2003；胡光夏, 2004）。

¹² 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media pool system）是美軍參酌英國福克蘭戰爭中的媒體管制措施，逐漸發展成的一套戰時媒體管理系統，由媒體推薦人選，並由軍方人員「扮隨」（escort）參與前線的戰地採訪，並且要將所採訪的新聞分享給未分配到前線採訪名額的媒體使用。

¹³ 沙漠風暴行動是美軍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的軍事行動代號，美軍在海外的軍事介入行動通常都會取一個軍事行動的代號。

¹⁴ 是指要刪除有關越戰失敗的歷史記憶。

¹⁵ 媒體嵌入制是美英聯軍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所採用的媒體管理策略，將媒體記者安置前線的部隊中，隨軍採訪戰地新聞。

越戰將戰爭報導帶進了閱聽眾的客廳中，而 2003 年網際網路的新聞報導，則將戰爭直接帶進了民眾上班的工作地點。美國微軟公司全國廣播公司網站主編迪安·萊特曾說：「從報導方面看，這（指美伊戰爭）可以看作是一場網際網路戰爭……我們網站的主要賣點就是使用現場影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戰爭帶進工作地點。」（轉引自李新，2003）。

前 MSNBC 編輯，現任 RealNetworks 負責人 Merrill Brown 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開戰前即已指出，由於美國和伊拉克有 8 個小時的時差，再加上寬頻網路市場的高度成長和無線電腦科技的發展，網路將首次在重要新聞事件報導中，和電視與其它媒體佔有同等的重要地位（轉引自 Swartz, 2003）。

根據美國一項調查顯示（Rainie, Fox and Fallows, 2003），2003 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後，美國有 77% 的網路用戶上網都與這場戰爭有關聯，在 1.16 億的網路用戶中有 55% 是透過電子郵件和他人交換戰爭的看法或了解戰爭的最新動態，而有 17% 的網際用戶聲稱網際網路是他們瞭解戰爭動態的主要途徑之一，此一數字遠高於 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 3%。在戰爭爆發期間，55% 網際網路用戶的電子郵件使用與伊拉克戰爭有關。由於透過網路瀏覽、傳遞和討論戰爭新聞的人數創下新記錄，使得網路新聞學（online journalism）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胡光夏，2004）。

事實上，美國 CNN、ABC 和其它的電視網在 2002 年美國對阿富汗戰爭時，曾計畫運用網路來報導新聞，但因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政府禁止媒體記者使用網路，使得這些媒體只能依賴衛星電話來傳送相關報導（Swartz, 2003）。

網際網路不僅被用來傳遞新聞資訊，更被用來作為戰爭的工具。世界上第一起資訊游擊運動（Information Guerrilla Movement）是由墨西哥為爭取切帕斯省自治的 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所發起的（Thussu, 2000）。在 1999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南斯拉夫聯盟的轟炸行動中，雙方的網路駭客分別攻擊了塞爾維亞與北約的網站，此一相互網路攻擊被視為是第一場的網路戰爭（Thussu, 2000）。

隨著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電視媒體新聞記者的配備也全面的數位化，這些裝備包括筆記型電腦、數位攝影機、SNG、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數位剪接機等，使得文字、聲音與影像能結合在一起，並以最快的速度傳送給閱聽眾（楊樺、余佳樟，2000）。

與 2003 年的戰爭相比較，1991 年的戰爭報導一切都顯得較「慢」。在 2003 年的報導提供了許多「真實電視」（reality television）的報導型式，時間、人物和戰爭都是同時的，有些甚至是提供敵我雙方「遭遇戰」的立即報導（Hoskins, 2004:46-47）。許多湧現出來的報導都是正在發生的事情，而部分報導則是透過錄影畫面（videographics）的使用，但主要是因為立即傳送科技的發展，使得「真

實電視」的戰爭報導得以展現。也就是說，透過電視的切割畫面處理，可以同時在事件的不同地點不斷地加以切換。在兩次波斯灣戰爭期間都同時有採用電視切割畫面的方式來處理新聞，但 1991 年比 2003 年的談話人的畫面較多（Hoskins, 2004），主要是因為美軍在 2003 年採取嵌入記者制，使得記者得以隨軍拍攝到較多的戰場影像。

美英等國基於在 1991 年波灣戰爭中，限制記者採訪的相關作為，在戰後招致媒體強烈的批評。因此，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特別允許近 500 多名本國與國際媒體記者隨軍採訪（胡光夏，2003）。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軍記者的功能是在向國民報導例行的戰況，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嵌入制」則是美國政府在爭取世界輿論日漸重要的背景下，現代政府公共關係和軍事心理戰中的一次技術的大躍進。「嵌入制」意謂著要贏取輿論的戰略，不再採取攔堵消息的方式，而是採取「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式，來影響媒體，在表面上與形式上是雙方互利，但卻能夠達到透過媒體來進行「議題設定」的功能（張巨岩，2004：76）。

對於新聞記者，特別是戰地記者而言，如何將所採訪的報導傳送回新聞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科技的進步，使得記者在工作效率與速度方面能大幅的改善。在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期間，就已有記者採用衛星手提電話，來傳送所採訪到的新聞。但當時由於手提電話體積較大，費用昂貴，再加上發稿時無法確保聲音和影像效果，因此，戰地記者較少採用。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情況則大為改觀。一位派駐在伊拉克北部的 NBC 記者就曾比較他在 1989 年採訪美國入侵巴拿馬與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差異。他表示，在 1989 年時的衛星傳送器重達 800 磅，要花 5 個小時才能架設完成，2003 年的簡易衛星傳送器只有 140 磅（Tumber and Palmer, 2004）。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的最創新科技之一是「廣電組合器材」（broadcasters' kit），能使得記者不需要小型衛星碟，就能將報導傳送回自己的媒體組織。新聞採訪的設備，配備有小型的數位攝影機、電腦與衛星電話，使得記者能夠捕捉、編輯、剪輯和傳送影像。例如，美國 ABC 電視台的記者 Don Dahler 與 Joe White 可以攜帶著這些輕便的器材與 101 空降師一起行動（Tumber and Palmer, 2004:22）。MSNBC.com 的國際編輯 Preston Menden-Hal 配備著 15000 美元的衛星電話與電腦。Menden-Hall 稱自己為一人團隊，包辦所有在戰區的文字寫作、攝影與拍影帶等工作。他被稱為是新世代的「背包新聞記者」（backpack journalist），比一位傳統的攝影人員更具移動性與彈性。這些背包新聞記者也被稱為是單一的新聞記者（solo journalists, 或者 sojos）（Tumber and Palmer, 2004:23）。新傳播科技已使得新聞記者的工作更為即時性。

六、討論與結語

本研究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針對不同時期的戰爭中，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對於戰爭與戰爭新聞產製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戰爭可以說是新科技發展的激發者與採用者。科技的進步使得戰爭從機械化、工業化，再到資訊化。同時，也將民眾以不同的型式捲入了戰爭。民眾從總體戰的被全面動員參與戰爭，到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局部動員參與戰爭，甚至僅是扮演「全程觀看參與戰爭」。

傳播媒介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提供人們不同與更為廣泛的方式來目睹戰爭。19世紀中日益增加的識字率、交通運輸網與較進步的印刷機器的出現，在許多的國家中出現了大眾傳播媒體。廣播媒體的出現，使得戰爭報導的速度加快。電視與錄影帶的出現，更使得一般民眾可經由螢幕來看到戰爭。而衛星技術、無線與網際網路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閱聽眾觀看戰爭從越戰時期的「客廳」轉移到 2003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的「工作場所」，並且從即時性的報導，轉變成立即與現場的報導。就如同 Paul Virilio (1989:7) 所說的：「戰爭的歷史是感知快速改變的歷史。」

傳播科技的發展對於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報導帶來了一些正面的影響，例如，戰爭報導的速度加快，從非同步到同步的呈現戰爭的景像，從報紙到廣播，再到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突破地域的限制等。然而媒體報導速度的加快，以及影像媒體的報導戰爭，由於可能會呈現出戰爭的恐怖景像，以及曝露軍事決策的缺失等因素，對於戰爭的決策者會帶來強大的民意壓力，因此，國家通常都會以國家與軍事安全為由來阻擾與限制媒體的採訪，並逐漸發展出精巧的媒體互動模式，從媒體聯合採訪制的限制為目的，到媒體嵌入制的融入，使得媒體記者與前線部隊成為生命共同體，並且能主動的從軍方的角度與觀點來「詮釋」與「框架」戰爭。

從新傳播科技的發展與戰爭報導的層面而言，有兩點值得思考。首先，新傳播科技的運用，能否使媒體更能發揮監督政府戰爭決策的功能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從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主要的原因有二個。第一、擁有強大資源來發動戰爭的國家（如美國），在發動戰爭前已將媒體計畫納入戰爭計畫的核心之一，因此，透過媒體的管理與管制策略，已將媒體的負面效應加以考量與防範，不僅藉由假消息與假事件的公關手法來導引與設定議題的框架，也採用「消失美學」¹⁶誘導媒體將報導焦點集中在新式武器本身，而透過視覺媒體所呈

¹⁶ 指不讓媒體在畫面上呈現出受傷與死亡等殘酷戰爭景像。

現的戰爭景像就如同電玩遊戲一般。第二、媒體在「市場導向新聞學」的驅動下，一切以成本效用為主要考量，不願投資調查性的報導，而依賴官方消息來源與大量採用公關新聞稿，自然無法深入挖掘戰爭的決策過程、戰爭的不人道與慘忍面，使得戰爭的報導所呈現出來的是空洞、虛幻、虛擬與仿真，完全無助於對戰爭的瞭解。

其次，戰爭中的媒體與記者應扮演何種角色呢？儘管新傳播科技使得媒體在採訪配備、新聞時效與影像品質等方面都產生了許多的正面影響，但媒體報導戰爭常會陷入兩難的局面，一方面，媒體記者要報導真相，另一方面，由於倫理道德與愛國情操等因素，對於己方的消息來源通常會避免加以批判，最後卻變成扮演戰爭啦啦隊的角色，甚至像國營的媒體般（張巨岩，2004）。Kumar（2006）曾以美國媒體為例指出，有五項因素可以說明此種表現趨勢：第一、媒體過度依賴政府等官方消息來源；第二、專業新聞學意理對於官方消息來源的順從；第三、缺乏對於調查性新聞的資助；第四、對於不同於政府決策的聲浪加以邊緣化；第五、媒體提倡自我審查的機制。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有四個：第一、分析的對象主要是以西方的國家為主，且在戰爭的選擇上也未全面的納入分析，僅選擇特定的幾個戰爭；第二、從傳播科技的演進，特別是以平面、廣播與視覺媒體等角度切入，難免會產生傳播科技決定論與媒體為中心論的疑慮，而忽略了新傳播科技發展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因素的探討，且對影響傳播媒體產製的新傳播科技並未逐一與詳盡的加以分析，因而可能會產生一些疏漏；第三、戰爭報導時期的劃分，只突顯出重要媒體的特點，而忽略了分析其它媒體仍扮演著一定的戰爭資訊提供角色；第四、由於採用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分析架構，主要是從鉅觀的產製層面加以探討，並未觸及文本與閱聽人方面的研究。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方鵬程（2007）。《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王凱（2004）。《數字化部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朱振明譯（2007）。《傳播的世界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吳福生譯（2001）。《數位戰爭：前線觀點》。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李茂政（1999）。〈大眾傳播過程批評性的消費者〉，《傳播與社會》，世新大學新聞系編著。台北：揚智。
- 李恭蔚（2000）。《美國南北戰爭研究：戰爭原因和歷史解釋》。高雄：春暉出版社。
- 李新（2003）。〈針對伊拉克戰爭 互聯網重新定義新聞報導方式〉，原載中國日報網站，引自<http://www.sina.com.cn> 2003年3月25日。
- 李嘉（1984）。〈我在韓戰中的戰地採訪經驗〉，《國際採訪》。台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周俊雄（2004）。《2003年美伊戰爭媒體專業倫理與新聞採訪安全》，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侯志欽、劉新白（1999）。〈現代廣播概論〉，世新大學新聞系編著，《傳播與社會》，頁325-351。
- 段慧敏譯（2005）。《西方媒介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胡光夏（2003）。〈2003年美伊戰爭新聞處理之研究〉，《復興崗學報》，78期，頁193-220。
- 胡光夏（2004）。〈網路新聞學發展的契機與轉機：第二次波斯灣戰爭中網路新聞報導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80期，頁15-42。
- 胡光夏（2005）。〈廣播運用於政治與軍事衝突之研究：以兩次波斯灣戰為例〉，《復興崗學報》，第83期，頁89-116。
- 胡光夏（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台北：五南出版公司。
- 胡懷（1995）。《新世紀世界史百科全書》。台北：貓頭鷹。
- 郎玉衡（1990）。《電視在革命：明日的電視世界》。台北：正中書局。
- 倪樂雄（2002）。《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上海書店

- 出版社。
- 唐淑芬編（1994）。《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展江（2001）。〈軍事記者：戰地記者縱橫談〉，《新聞與成才》，第484期。
<http://www.pladaily.com.cn/item/xwycc/200105/txt/29.htm>。
- 徐佩雯譯（2001）。《如何成為傑出電視女記者》。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 馬劍（2004）。〈遠古時代一商〉，《圖說中國歷史》，吳澤主編。台北：京中玉。
- 崔蕙萍、鄭曉村譯（1984）。《凱撒的高盧戰記》。台北：帕米爾書店。
- 張巨岩（2004）。《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與戰爭》。北京：三聯書店。
- 張廣智（2000）。《影視史學》。台北：揚智。
- 梅長齡（1982）。《電影原理與製作》。台北：三民書局。
- 習賢德（1996）。〈軍事新聞發布的表象與真相〉，《一九九六年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 陳衛星譯（2005）。《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傅大為（2003）。〈再會吧！南丁格爾精神〉，《當代》，190期。
- 傅凌譯（1994）。《新戰爭論》。台北：（原書 Toffler, A. & Toffler, H. (1993).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曾恩波編著（1975）。《傑出的攝影家》。台北：藝術圖書。
- 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人類傳播史》。台北：遠流。
- 程之行（1995）。《新聞傳播史》。台北：亞太圖書。
- 楊樺、余佳樟（2000）。《頭條任務：華人傳播界經典之國際新聞採訪實錄》。台北：星定石。
- 聞亦道（2003）。〈隨軍記者；Embedded Reports〉，《商業周刊》，385期。
- 聞亦道（2003）。〈隨軍記者；Embedded Reports〉，《商業周刊》，385期。
- 蔡繼光等譯（2000）。《瞭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 黎瑞剛等譯（2006）。《意見與異見：半導電視台的崛起》。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蕭乾（1995）。《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次大戰》。台北：時報文化。

二、英文書目

- Al-Kindi, A. (2004). War Agains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in *Global Media*

- Go to War: Role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edited by R. D. Berenger, pp. 333-341. Spokane, WA: Marquette Books.
- Altschull, J. H. (1995) (2nd ed.). *Agents of Power*.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Baudrillard, J. (1995).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 (2003). Operation Perfect Storm: The Press and The Iraq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port*, 13:3.
- Bergman, C. (2003, March 26). Technology Brings the Battle Home.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ojr.org/ojr/bergman/p1048703210.php>.
- Betting, R. V. (1996). *Copyrighting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olter, J. d. and Grusin, R. (1999).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London: The MIT Press.
- Boyd-Barrett, O. and Rantanen, T. (1998)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rown, R. (2003). Spinning the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87-10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rowne, D. R. (1982). *International Radio Broadcasting: The Limits of the Limitless Medium*. New York: Praeger.
- Caldwell, J. T. (1995). *Televisuality – Style, Crisis, and Authority in American Televis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arruthers, S. (2000).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ate, H. C. (1998). Military and Media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Media Issues*, edited by Lloan, W. D. and Hoff, E. E., pp. 105-119. Northport, AL: Visim Press.
- Chomsky, N. (2003). *Power and Terror: Post 9/11 Talks and Interviews*. NY: Seven Stories Press.
- Cohen, B. C. (1994). A View from the Academy. In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edited by W. L. Bennett and D. L. Paletz, pp. 8-11.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E. A. (1996). A Revolution in Warfare, *Foreign Affairs*, 75:2, pp. 37-54.
- Curran, James & Seaton, Jean (1997) (6th ed.).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Routledge.
- Dower, J. (1986).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Y: Pantheon.
- Durent, W. and Durent, A. (1968).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Y: Simon & Schuster.
- Elmer-Dewitt, P. (1994). Battle for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Internet, *Time*, 25 July, pp. 50-56.
- El-Nawawy, M. and Iskandar, A. (2003). *Al-Jazeera: The Story of the Network That Is Rattling Governments and Redefining Modern Journalism*. Cambridge, MA: Westview Press.
- Fahmy, S. and Johnson, T. J. (2005). How We Performed: Embedded Journalists'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s Covering the Iraq Wa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 2, pp. 301-317.
- Ferguson, M. and Golding, P. (1977)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Fortner, R. S. (199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Belmont, CA: Wadsworth.
- Frederick, H. (1993).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dsworth.
- Furieux, R. (1964). *News of War: Stor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Great War Correspondents*. London: Max Parrish.
- Gerbner, G. (1992). Persian Gulf War, the Movie,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243-265.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Gerbner, G. (1992). Persian Gulf War, the Movie,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243-265.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Gladney, G. A. (2004). Global Village Disconnected? In *Global Media Go To War: Role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edited by R. D. Berenger, pp. 15-27. Spokane, WA: Marquette Books.
- Glaser, M. (2003, December 18). A Look Back at 2003 and What's on the Horizon for the Online News Universe.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ojr.org/ojr/glaser/1071797940.php>.

-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96).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edited by Curran, J., Gurevitch, M. and Woollacott, J., pp. 291-308.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 Hachten, W. A. (1992) (3rd ed.).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mes,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ale, J. (1975). *Radio Power: Propaganda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London: Paul Elek.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1997). The Media and War, in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 A Critical Survey*, edited by Corner, J., Schlesinger, P. and Silverston, R., pp. 206-231. London: Routledge, 1997.
- Hamill, P. (2004). The War Without Blood, *Quill*, September.
- Head, S. (1985). *World Broadcasting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lmont, CA: Wadsworth.
- Headrick, D. (1981).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 and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Y: Pantheon Books.
- Hila, M. and Hila, Judy(2004). *Media at War: The Iraq Crisis*. London: Sage.
- Hobsbawm, E.(1995).*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Abacus.
- Hoffman, B.(2006). *Inside Terroris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skins, A.(2004). *Televising War: From Vietnam to Iraq*. London: Continuum.
- IFJ(2003). Press Freedom and Safety. <http://www.ifj.org/default.asp?Issue=PRESSFREEDOM&Language=EN>.
- Ignatieff, M. (2000). *Virtual War: Kosovo and Beyond*.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Kamalipour, Y. R. (2004). Language, Media and War: Manipulating Public Perceptions, in *Global Media Go to War: Role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edited by R. D. Berenger, pp. 87-94. Spokane, WA: Marquette Books.
- Kmar, D. (2006). Media, War, and Propaganda: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3:1, pp. 48-69.

- Knightley, P. (1975). *The First Casualty: 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 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Propagandist, and Myth Maker*.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nightley, P. (1989). *The First Casually – 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 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Propagandist and Myth Maker*. London: Pan Books.
- Knightley, P. (2003). The Battle for Our Hearts and Minds, *Guardian*, 2 April, p. 22.
- Knightley, P. (2003a). History or Bunkum?,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s*, 14:2, pp. 7-14.
- Louw, P. E. (2001).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Sage.
- MacArthur, J. R. (1993). *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L. J. (1980). The Moving Target: General Trends in Audience Composition. In Lasswell, H. D., Lerner, D. & Speier, H. (eds.),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Vol. 3: A 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p. 249-294.
- Mathews, J. J. (1957). *Reporting the War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Chesney, R. and Nichols, J. (2002). *Our Media, Not Theirs: The Democratic Struggle Against Corporate Media*. NY: Seven Stories Press.
- McLuhan, M. & Fiore, Q. (1968).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NY: Bantam Book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NY: McGraw-Hill.
- Morgan, M., Lewis, J. & Jhally, S. (1992). More Viewing, Less Knowledge,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216-23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 Murdock, G. (1982).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London: Methuen.
- Murdock, G. and Golding, P.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London: Edward Arnold.
- Norris, V.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An Exploration of*

- Fundamental Concepts.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Rainie, L., Fox, S. and Fallows, D. (2003). The Internet and the Iraq War: How Online Americans Have Used the Internet to Learn War News, Understand Events, and Promote Their Views. <http://www.PEWINTERNET.ORG>.
- Schudson, M. (1991) (2nd ed.).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London: Edward Arnold.
- Sherman, H. J. (1987). *Foundat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 Sperber, A. M. (1986). *Murrow: His Life and Times*. NY: Freundlich.
- Swartz, Joh (2003). Iraq War Could Herald A New Age of Web-based News Coerage. *USA Today*, March 19.
- Taylor, P. (1997).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 Media Since 1945*.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P. M. (2003). Journalism Under Fire: The Reporting of War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edited by Simon Cottle, pp. 63-79. London &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Thussu, D. K.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ward Arnold.
- Thussu, D. K. and Freedman, D. (2003). Introduction,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1-12. London: Sa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Y: The Free Press.
- Tumber, H. and Palmer, J. (2004). *Media at War: the Iraq Cri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Vincent, R. C. (1992). CNN: Elites Talking to Elites, in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 Mowlana, G. Gerbner, H. I. Schiller, pp. 181-20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 Virilio, P.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London: Verso.
- Volkmer, I. (1999). *News in the Global Sphere – A Study of CN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 Voss, F. (1989). *Reporting the War: the Journalistic Coverage of World War II*. NY: Greenwood Press.

胡光夏

- Webster, F. (2003). Information Warfa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57-6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illiams, F. (1991). The Shape of News to Come: The Gulf War as an Opportunity for TV News to Show Off, and to Raise Questions, *Quill*, September, pp. 15-17.
- Williams, K. (1992).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ruth: Ethical Issues in *War Reporting*, in *Et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edited by A. Belsey and R. Chadwick, pp. 154-170. London: Routledge.
- Wood, J. (1992).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London: Peter Peregrinus.
- Woodward, G. C. (1993).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e Military and the Press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in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edited by R. E. Denton, Jr., pp. 1-26.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 Young, P. and Jesser, P. (1997). *The Media and the Military: From the Crimea to Desert Strike*. NY: St. Martin's Press.

(投稿日期：96 年 7 月 24 日；採用日期：96 年 11 月 21 日)

傳播科技發展及其在不同時期戰爭中的新聞產製